

岭南青铜文化研究综述

兰迪

(湖南大学岳麓书院, 湖南长沙, 410082)

摘要: 岭南地区青铜文化的发现与研究已有多数。关于岭南青铜文化的诸多问题, 如岭南青铜文化出现于何时, 岭南青铜文化的来源等问题一直是学界争论的焦点。通过对这一阶段岭南青铜文化研究著作及论文的梳理和研究, 我们可以窥见岭南青铜文化研究的进展情况。

关键词: 岭南、青铜文化、青铜器

岭南地区青铜文化的发现与研究已有多数。一方面, 岭南地区的考古工作的蓬勃开展为研究者提供了丰富的实物及遗迹资料; 另一方面, 来自不同领域的钱币研究者分别从各自的角度对岭南青铜文化进行研究, 使得研究的广度和深度都有很大的扩展和突破, 并取得了不少成果。通过对这一阶段岭南青铜文化研究著作及论文的梳理和研究, 我们可以窥见岭南青铜文化研究的进展情况。

一、岭南青铜文化遗存的重要考古发现

岭南地区墓葬和遗址中出土的青铜器是较普遍且重要的实物资料, 而铸铜遗物是了解铜器铸造最直接的材料, 这两方面的考古材料成为研究岭南青铜文化及其相关问题的重要基础资料。

(一) 岭南青铜器的主要考古发现

目前岭南地区出土青铜器的遗址及遗物点中, 比较重要的主要分布在西江、北江、文西桂江流域以及南宁地区。包括有清远马头岗、四会鸟旦山、罗定南门洞、罗定背夫山、四会高地园、德庆落雁山、广宁铜鼓岗、肇庆松山、恭城秧家、宾阳韦坡、象州下那曹、平乐银山岭、武鸣安等秧、元龙坡等。

(二) 铸铜遗物的发现

与铸造铜器密切相关的预存主要就是铸铜遗址和铸范。从目前已发表的资料来看, 岭南地区尚没有铸铜遗址的发现, 但是浇铸铜器的铸范已有少量发现, 珠海棠下环遗址中出土一件石范, 另在与棠下环相邻的珠海淇澳岛亚婆湾遗址采集到四件石范, 武鸣元龙坡也曾出土一批砂石铸范。这些石范所能浇铸的均是器型简单、体积较小的武器, 这也反映出了当时岭南地区的铸造技术较为原始。

由于岭南地区的青铜文化发展序列还未完全建立, 对于这些已发现遗存的年代多是参考相邻地区及中原地区的考古发现, 因此, 一些考古报告中所定的年代还存在争议。

二、相关问题的研究

正因为岭南地区青铜文化遗存的年代存在诸多疑问, 所以关于岭南青铜文化的诸多问题, 如岭南青铜文化出现于何时, 岭南青铜文化的来源等问题一直是学界争论的焦点。

(一) 岭南青铜文化的上限及分期

莫稚把广东几何印纹陶阶段文化分为四期, 其中第二期是青铜器时代, 西周至春秋时期以夔纹为主要特征的几何印纹硬陶阶段; 第三期是青铜器时代, 战国时期以米字纹为主要特征的几何印纹硬陶阶段。认为广东地区的青铜文化, 可以分为西周至春秋和战国两期。

杨式挺认为岭南青铜文化可分为三个时期, 第一期是“初露头角”的商周时期, 第二期是初步发展的春秋至战国早期, 第三期为战国中晚期至西汉前期。

何纪生认为商末至西周时期广东地区开始使用青铜器, 并把夔纹陶以前的青铜器划为第一期, 为商末至春秋中期; 与夔纹陶共存的划为第二期, 为春秋晚期至战国早期; 与米字纹陶共存的划为第三期, 为战国中、晚期。

邱立诚将广东青铜文化分为三期: 第一期年代约为商至周初, 是广东青铜文化的萌发期; 第二期年代为西周春秋, 下限在战国早期, 是广东青铜文化的发展期; 第三期年代为战国中晚期, 是广东青铜文化的鼎盛期。

黄展岳认为中原青铜器在两广的出现, 最大的可能应是在楚国势力直接进逼岭南时传入, 时间最早不超过春秋晚期, 包括殷末西周器在内。他在另一篇文章中指出: “两广先秦文化大约形成于春秋时期或稍早, 至战国晚期发展到鼎盛阶段。”

李龙章认为两广发现的青铜时代越墓年代一般较晚, 大体处在战国至西汉初期; 夔纹陶类型遗存的上限不早于春秋晚期, 下限在战国晚期, 与米字纹陶遗存年代衔接。他还认为两广青铜器墓葬大多属于南越国时期。而岭南地区至少在春秋晚期之前两广地区尚无土著的青铜文化。

综合以上观点, 对于岭南青铜文化出现的时间, 主要有两类观点, 一类是岭南青铜文化出现于商周时期; 另一类观点则认为岭南青铜文化出现的时间至少不早于春秋晚期。

(二) 岭南青铜文化的来源

无论是青铜器出现的时间、发现的数量, 还是种类、档次, 以及工艺水平、精美程度, 岭南地区都无法和其周边几个主要青铜文化分布区相比, 如湖南、云南、四川等。和古代中国青铜文化的核心区域——中原地区相比就更属天壤之别了。所以目前还没有哪位学者认为岭南的青铜文化是在不受任何其他文化的影响下而完全独立发展起来的。换言之, 岭南青铜文化是在外来文化因素的影响下产生和发展的。但这个外来文化因素主要来自何方, 却有不同观点。

李龙章认为两广青铜文化从战国开始突然繁荣应与湖南等地越人迁徙至岭南密切相关,而湖南等地越人的迁徙是受楚国势力压迫所致。而且将原来与四邻民族交流所吸收到的周、楚、徐、吴、越、滇、巴等民族的文化因素也带到了岭南。

何乃汉认为先秦时期活跃于岭南西部地区的骆越实际上并非是百越族群,而是属于百濮族群,岭南地区出土的一些青铜器,如羊角钮钟等铜器传入岭南正说明了骆越与百濮存在密切联系。

卜工认为中原青铜文化对岭南青铜文化的影响是间接的,岭南最早的青铜制作技术是中原文化因素经由吴城文化、浮滨文化传到岭南的。

蒋廷瑜通过对古文献和考古资料的分析,对楚国的南界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文章认为:“楚国的南界,实际上已越过南岭山脉,溯湘江而上,进入了漓水流域,大抵在今广西北部桂林附近。湘漓二水的分水岭可能是比较稳定的楚越交界处。”“岭南的青铜文化是在楚文化影响下产生和发展起来的,本身从一开始就包含着楚文化的因素。”

李龙章对前述蒋廷瑜的观点提出质疑。他在对吴起“南平百越”与古苍梧地望、“濊胡”方位与楚国用兵对象、《鄂君启节》中一地名的考释及定位进行了分析后,认为“迄今为止没有任何有力的文献资料或考古材料能确证岭南地区在先秦时期曾属楚国疆域,因此‘楚国南界越过南岭’的说法实难成立,而据此说推导出的楚文化长期深入影响岭南的观点也属不当。”

从目前的考古发现来看,在岭南地区的确还没有发现可以确指为楚墓的资料,楚文化因素在岭南青铜时代墓葬中所占的比重也不大,可以肯定都是典型的越人墓葬。因此,李龙章的观点目前更具合理性,但蒋廷瑜也并未认为岭南全境归楚所有。综合各家观点,可以说楚人从未占领过整个岭南,甚至也没有伸入到岭南腹地,但可能越过南岭,到达过今广西东北部一隅。

岭南青铜文化的最终来源是中原地区的青铜文化,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只不过这种影响是间接的。另外,可以肯定的是,岭南青铜文化并非由一种文化影响发展起来的,而是多种文化相互融合产生的,其中主要的文化因素还是以越族文化为主。

三、存在的问题

随着考古工作的开展和研究的深入,岭南青铜文化的来源已经逐渐明朗。但是对于岭南青铜文化究竟出现于何时,争议依然存在,两类观点的差异如此之大,我们认为是由多方面原因造成的。

一是大家对于青铜文化的概念没有达成基本共识,如有的学者认为“文化内涵中包含有

青铜制品的考古学文化就是青铜文化,也就是说,不论其青铜器的来源如何,只要这支考古学文化的主人曾经使用青铜器,就可以称之为青铜文化”,我们认为这样的概念是不可取的。如果一种文化中的青铜器是外来的,那也只能证明这种文化受到其它青铜文化的影响,而不能说这种文化本身已经是一种青铜文化。依据考古学文化的定义,我们认为,岭南地区的青铜文化应是同一时代、分布于岭南地区,并由若干共同的青铜文化特征的遗物和遗迹所组成的文化遗存。这种文化能反映岭南地区的某一文化共同体。

二是对岭南青铜文化遗存的年代推断不一。由于岭南的青铜文化尚未建立起自己的发展序列,因此,在判断遗迹、遗物的年代时需参考相邻地区或中原地区,在这一过程中就会出现一些问题。一方面,有的考古工作者仅依据遗址中出现的几件与中原商周时期青铜器相似的器物,就将整个遗址的年代提早,而忽视了那些年代晚的遗存,如广西武鸣马头元龙坡墓葬群,发掘者根据元龙坡墓地出土西周铜卤、铜盘和碳十四年代测定数据,认为元龙坡墓葬的年代上限为西周,下限在春秋时期,但元龙坡墓葬的主要铜器形态大都是春秋晚期才开始出现或战国时期才流行的。另一方面,一些学者将岭南青铜器与中原青铜器做对比时,往往没有考虑到文化传播的滞后性,认为同一文化因素在岭南出现的时间是与中原同步的。

三是相信成说,先入为主。从诸家观点来看,对岭南早期考古学文化阶段“曲折纹陶类型文化”→“夔纹陶类型文化”→“米字纹陶类型文化”的相对年代和发展序列已基本形成共识。各家对分期和绝对年代的判断也主要是围绕着对这三种具有代表性文化特征的发展阶段的认识来展开。尤其是“夔纹陶类型文化”与“米字纹陶类型文化”的绝对年代目前仍没有定论,但是长期以来,一些学者把以“米”字纹陶为显著特征的遗存归入战国时期,认为“‘米’字纹陶类型文化的时代上限与夔纹陶类型文化相接,下限与秦汉文化相连,属广东战国中、晚期文化,时间比较明确”。基于这样的认识,岭南地区发现的“米”字纹陶遗存,绝大多数都归为战国时期。“但现在已知的所谓‘战国时期’的‘米’字纹陶类型只要全面分析其文化内涵,有很大一部分应改断为汉代”。如“平乐银山岭‘战国墓’,除出有许多至汉代才流行的铁器外,所出的印有‘米’字纹、方格纹,或刻划有弦纹、水波纹、绶纹的轮制泥制硬陶(有青绿釉陶)瓶、三足瓶、三足盒、盒、奩耳罐、三足壶等器物均见于广州西汉早期墓”。

四是对一处墓葬或遗址的断代未能综合各方面的情况加以判断,过分相信个别的碳十四测定数据。碳十四年代测定方法应用于中国考古学是重要的,尤其用于测定史前遗址和墓葬的年代是不可或缺的手段。但碳十四年代测定的方法也存在不足,容易因各种自然或人为因素的干扰而影响它的准确性,尤其是用于较晚历史时期遗址或墓葬的断代,误差更为明显。

已有学者指出岭南地区属于石灰岩地貌，碳十四测定年代时往往会出现数值偏高的情况。

从以上情况看来，岭南青铜文化的出现不早于春秋晚期的说法应该是更合理一些，岭南地区出土的所谓商周时期的青铜器数量极少，只是零星发现，仅凭这些器物判定岭南地区已产生青铜文化，实难服众。进一步来说，发掘者对这些青铜器的年代判断本身就存在许多问题。

四、结语

综上所述，关于岭南地区青铜文化的肇始研究依然是任重道远。一方面，还需要更多新的考古资料来完善岭南地区的文化发展序列；另一方面，早年考古资料中存在的遗留问题需要后来的研究者们加以考证，从而得出更为科学的结论。

参考文献:

- [1] 广东省博物馆:《广东清远的东周墓葬》,《考古》,1964年第3期。
- [2] 广东省博物馆等:《广东德庆发现战国墓》,《文物》,1973年第9期。
- [3] 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广西恭城县出土的青铜器》,《考古》,1973年第1期。
- [4] 广东省博物馆等:《广东肇庆市北岭松山古墓发掘简报》,《文物》,1974年第11期。
- [5] 广东省博物馆:《广东四会鸟旦山战国墓》,《考古》,1975年第2期。
- [6] 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平乐银山岭战国墓》,《考古学报》,1978年第2期。
- [7] 蒋廷瑜:《楚国的南界和楚文化对岭南的影响》,《中国考古学会第二次年会论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82年,67-73页。
- [8] 广东省博物馆:《广东罗定出土一批战国青铜器》,《考古》,1983年第1期。
- [9] 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广西宾阳县发现战国墓葬》,《考古》,1983年第2期。
- [10] 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近年来广西出土的先秦青铜器》,《考古》,1984年第9期。
- [11] 广东省博物馆:《广东发现的几座东周墓葬》,《考古》,1985年第4期。
- [12] 广东省博物馆:《广东罗定背夫山战国墓》,《考古》,1986年第3期。
- [13] 黄展岳:《论两广出土的先秦青铜器》,《考古学报》,1986年第4期。
- [14] 黄展岳:《两广先秦文化》,《文物与考古论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86年。
- [15] 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广西武鸣马头安等秧战国墓群发掘报告》,《文物》,1988年第12期。
- [16] 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广西武鸣马头元龙坡墓葬发掘简报》,《文物》,1988年第12期。
- [17] 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珠海平沙棠下环遗址发掘简报》,《文物》,1998年第7期。
- [18] 唐振雄、李子文:《淇澳岛亚婆湾、南芒湾遗址调查》,《珠海考古发现与研究》,广东人民出版社,1991年。
- [19] 杨式挺:《岭南先秦青铜文化考辨》,《铜鼓和青铜文化的新探索——中国南方及东南亚地区古代铜鼓和青铜文化第二次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1991年。
- [20] 何纪生:《略论广东东周时期的青铜文化及其与几何印纹陶的关系》,《文物集刊》,北京:文物出版社,1991年,212-224页。
- [21] 李龙章:《“楚国南界越过南岭”说商榷》,《广东社会科学》,1992年第3期。
- [22] 李龙章:《试论两广先秦青铜文化的来源》,《南方文物》,1994年第1期。
- [23] 李龙章:《湖南两广青铜时代越墓研究》,《考古学报》,1995年第3期。
- [24] 邱立诚:《广东青铜文化的土著特色》,《考古与文物》,1999年第2期。
- [25] 卜工:《环珠江口商时期考古学研究的几个问题》,《考古》,2002年第2期。
- [26] 李龙章:《两广夔纹陶类型遗存年代问题商榷》,《南方文物》,2003年第1期。
- [27] 李龙章:《广西右江流域战国秦汉墓研究》,《考古学报》,2004年第3期。
- [28] 杨杰:《广东青铜文化的研究及相关问题》,《华东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3期。